

华美小说的对话性

尹燕

(东北林业大学,黑龙江哈尔滨 150040)

[摘要]作为亚美小说一部分并与亚美小说同步发展的华美小说写作始于十九世纪,二战后开始爆发。华美小说研究始于二十世纪末,如今已成为英美文学研究的方向之一。华美小说批评强调混杂性、多样性和异质性,研究内容已超越了身份政治,走向多元的人文主义批评。华美小说中存在各种相互抗衡的声音,巴赫金对话理论是诠释华美小说的有效手段,这些对话归根结底是东方与西方的对话。它们回答了如何对待东、西方文化,如何定位华裔文化身份的问题。通过对话,西方的独语被打破;从沉默到渴望获得认可到建立独立身份,东方话语实现了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知。

[关键词]对话理论;华美小说;文化身份;独语;东方话语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711X(2025)14-0196-03

doi:10.3969/j.issn.2096-711X.2025.14.067

[本刊网址] http://www.hbxb.net

一、亚/华裔英语小说的发展

美国少数族裔文学中,包括华裔、日裔、东南亚裔等在内的亚裔文学常被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作为亚美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华美小说的发展与亚美小说同步。亚裔美国作家的写作始于十九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裔的写作开始爆发。现实主义小说和自传是亚美小说的主要体裁;传奇小说、科幻小说和犯罪小说等也成为亚裔小说创作的重要体裁。亚裔作为模范少数族裔、主流与少数族裔的社会差异、身份归属、移民、帝国、战争、全球化等塑造了亚裔写作,亚裔在移民法中地位的不断变化、美国在亚太地区发动的几场战争、东西方经济的变化等元素贯穿于亚裔写作之中。于是,移民叙事、拘留回忆录、全球化下的流散叙事、从以美国为中心的身份表达转变为从流散和跨国视角发展而来的身份表达、女性主义等成为亚美小说的叙事传统。其中,移民叙事与美国移民法相关联。自十九世纪抵达美国以来,亚裔的社会生活一直被移民法所塑造,长达一个世纪的限制性移民政策于1965年结束。这种转变在亚美小说中被记录下来,它反映、质疑并重新想象了移民的人生轨迹。移民叙事的另一个内容为,亚美小说通过讲述亚洲家庭价值观对亚裔作为模范少数族裔做出了肯定。二十世纪美国在亚洲进行的战争促成了亚美小说战争叙事传统的形成。战争对幸存者及其子女造成的创伤、非殖民化时代亚洲国家的自相残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裔美国人被拘留、越南战争期间美国本土的反战运动、朝鲜战争、9·11事件之后的反恐战争都成为亚美小说写作的重要元素。二十世纪末,学者和评论家开始研究亚美作品,亚美小说研究成为英美文学研究的领域之一。亚美小说批评强调混杂性、多样性和异质性,研究内容超越了狭隘的身份政治,走向多元化的人文主义批判。

作为亚美小说一部分的华美小说除了具备亚美小说的普遍特征,还具备自己的特点。第一批华美作家的写作往往与爱国主题有关。之后,华裔作家开始对华裔情感进行写作,这类小说中往往不存在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冲突,水仙花即为其中之一。之后的作品以华裔的同化、文化适应及在美国文化中的缺席等为主题。美国白人承认华人在文化上的优越性,但这种文化优越性以服务白人为目的。对于这种白

人至上主义,华裔往往以沉默作为回应。这种非交流性质的回应常常是无效沟通,它标志着白人种族主义对华人刻板印象的成功构建,也是华裔能够在美国生存下去的代价之一,黄玉雪的作品就清晰地表明这一点。刻板印象是建立和维护美国社会秩序、保持西方文明连续性、并以最小的努力去执行白人至上主义的一种行为模式。一方面,白人社会习惯了在刻板印象的范围内接受少数族裔;另一方面,刻板印象在少数族裔内部被个人和集体的自我蔑视所强化。白人对包括华裔在内的亚裔的刻板印象是缺乏男子气概,缺乏创造性与勇气等白人男性特质,于是唐人街的单身汉被主流社会拒绝或忽视。华裔作家赵健秀的小说中可以找到很多有关唐人街单身汉的描写。白人至上主义除了表现在对亚/华裔刻板印象的构建,还表现在华裔作家有志于写出漂亮、正确的英语句子上面,原因在于亚/华美作家需要以白人的文化符号、语言习惯和幽默感等文化品格书写他们的经历并赞美华裔的沉默。语言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工具,华美作家为了获得主流的认可必须英语写作,这实质上剥夺了他们对自己语言的使用并导致了华裔文化完整性的缺失甚至根除。语言是文化和情感的媒介,语言通过书写人们的共同经历将人们凝聚成一个团体,失去了语言就失去了文化,因此放弃汉语而使用英语写作是华裔小说中男子气概缺失的另一个原因。

二、对话性——华美小说的重要特征

美国少数族裔文学作品的突出特征是其对话性。小说的对话性是巴赫金学派的重要发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小说从形式到内容发生本质改变;与此同时,关注小说文体特征的俄国形式主义发展起来。然而,俄国形式主义对形式问题的过度关注导致了对小说意识形态及其意义的忽略,巴赫金对话理论应运而生。巴赫金对话理论首先关注了作为小说写作媒介的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巴赫金认为语言与意识形态不可分割,因为语言是传播意识形态的媒介,意识形态通过语言被下放给了不同的人物,经由语言传播的、彼此对抗的意识形态在小说里自由碰撞,小说的主题经由这种碰撞被呈现出来。巴赫金对语言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的考察对小说文本的发展和批评产生深刻影响。巴赫金对话理论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话语问题。巴赫金学派认为

收稿日期:2024-12-13

基金项目:本文系黑龙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阿多诺文学批评观研究”(项目编号:23WWB184)。

作者简介:尹燕(1973—),女,山东掖县人,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学理论、英语小说。

小说是多个声音对话、交流的场所,每一种声音专属某一阶级群体和话语团体。承载着意识形态的语言形成了各个人物的话语。小说在各种声音的对话中获得了最终的意义。话语的含义由上下文定义,上下文又由多种因素构成,包括话语产生的具体社会背景、说话者同听话者的关系等,不同的上下文使小说中的语言成为具有不同意义的话语。作者的话语、叙述者的话语、人物的话语、读者的话语、世界的话语进入小说中,各个话语主体之间的对话构成了整部小说。巴赫金尤其关注文本中各种话语对作者独语的打破,作者、叙述者、人物、读者、世界之间形成各种对话。小说中的对话形成八种对话关系:读者—主人公,作者—主人公,主人公—主人公,作者—读者,作者—作者,读者—读者,读者—世界,作者—世界。小说将来自不同主体的话语汇集起来,赋予小说以狂欢性,蔑视权威、颠覆等级。小说的对话性与狂欢性拒绝统一各个话语主体的不同观点,各个主体的观点保留着各自的完整性和独立性。从小说拓展到文化,整个文化也是各种声音和价值观的聚合体,不存在一种决定性的声音形成独语世界。在巴赫金看来,生活的本质就是对话,思想、艺术和语言的本质也是对话。对话的最高形式是狂欢和复调、多元和彻底。狂欢和复调理论抛弃了等级、独语和思想停滞。

相比于其他英语小说,华美小说的对抗性更强、更突出。华美小说中不同声音构成的对话包括华裔作家与主流作家的对话、华美小说读者与小说人物的对话、华美小说作者与人物的对话、华美小说人物之间的对话、华美小说作者与读者的对话、华美小说读者之间的对话、华美小说读者通过作品与周围世界形成的对话、华美小说作者与周围世界形成的对话。华美小说作品大体上始于十九世纪末。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50—60年代的作品主要与第一代华人有关,作品主要包括李恩富的自传《我在中国的童年时代》(1887)、水仙花的《赌徒》(1896)、伍廷芳的《一个东方外交官眼中的美国》(1914)、蒋希曾的《“出番”记》(1937)、刘裔昌的《父亲和裔昌》(1943)、林语堂的《唐人街的一家人》(1948)、黄玉雪的《华女阿五》(1945)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今,华美作品主要包括赵健秀的《龙年》(1974)、汤亭亭的《女勇士》(1976)、黄哲伦的戏剧《新移民》(1979)、徐忠雄的《家园》(1979)、谭恩美的《喜福会》(1989)等。这一时期华美作家的写作主要与华裔社群在美国的生存状况以及被歧视、被边缘化的历史语境相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在文化多元主义、全球化等力量影响下,华美文学作品趋于多元和复杂,主要包括任碧莲的《典型的美国人》(1991)、李健孙的《支那崽》(1991)、雷祖威的短篇小说集《爱的痛苦》(1991)、伍邝琴的《裸体吃中餐》(1998)等。上述作品虽然各有特色,但就其对话性来讲又具有共性。

首先,华美作者常与美国主流白人和华人社区这两个不同的世界产生对话。主流白人掌握了美国的价值观、政治、经济、教育等各领域,而华人游离于主流之外,在价值观、社会地位、生活习惯、文化习俗、工作类型、教育方式等方面都与主流白人区别甚至产生冲突。面对这两个世界,华美作者既参与了与主流白人的对话,也参与了与华人社区的对话。几乎每一部华美小说都有这种内容的对话。本质上,华美作者在代表华人与主流世界进行价值观、文化习俗、生活习惯等方面进行对话,对话的目的在于希望双方能够接纳彼此,尤其是主流白人对华人的接纳。

华美作者不仅与世界产生对话,也与包括其他华美作者、其他少数族裔作者、主流白人作者在内的其他作者产生对话。这些作家的观点可能相似也可能相对抗,其中最公

开的一场对话发生在赵健秀与汤亭亭之间。赵汤之争的发起人是赵健秀。他们的争论主要围绕华美文学如何真实再现华裔在美国社会的生活状况展开,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自传写作的风格、性别、对中国故事的改编产生的伪中国传统文化、对主流社会的迎合等问题。上述作者之间的对话常围绕移民相关的族裔文化展开。

华美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对话是产生意义的重要对话。其中,多数华美作品中的人物之间的对话产生于第一代华裔父母与其子女之间。受二十世纪初大熔炉理论的影响,第一代华裔常切断与中国的文化联系,转而努力融入白人基督教文化并成为模范少数族裔。这本质上是主流文化对少数族裔文化的专制。但是,随着民权运动的展开、越南战争的发生、种族意识的觉醒,去中心化成为美国社会的主体思想,大熔炉思想过渡到多元文化主义。包括华裔在内的少数族裔与主流之间的对话指向开放与平等,少数族裔文化价值获得提升。多元文化的形成有赖于少数族裔在经济上的成功,还有赖于少数族裔对自己的宗教、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坚持。多元文化影响下,少数族裔边缘群体开始发声,白人主流文化不再是少数族裔唯一的信仰。华美小说中这一阶段的对话主要在渴望融入主流文化的第一代华裔与其子女之间展开。以《莫娜在希望之乡》为例,莫娜与父母在信仰和身份认知上的对话构成了小说的主线。莫娜的父母受大熔炉思想的影响,追随主流文化。莫娜则受多元文化的影响,不再选择基督教而皈依犹太教。莫娜与父母所持的不同文化信仰构成了两个群体之间的对话。莫娜父母希望孩子们进入美国主流文化并获得认可。而莫娜在意识到不可能融入白人文化之后,开始了独立的身份探寻之路。莫娜发现了犹太教会和犹太文化的包容性、传统性、政治参与性和希望性,并在其中找到了文化归属。莫娜和父母关于信仰的对话改变了双方并促成双方对美国华裔文化的重新思考——多元文化背景下,华裔应该如何看待主流白人群体?华裔在美国的文化根基是什么?融合了主流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华裔文化是华人的未来,就像新犹太人一样。

三、结论

华美小说中最常见的对话是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对话,目的在于打破华裔沉默、打破西方独语、反对等级与不平等,但是这种对话也经历了几个阶段。《华人阿五》中的华裔以弱势话语与西方强势话语对话,黄玉雪旨在通过对话建立东方与西方的联系,实现东西方的沟通;《女勇士》将花木兰塑造成不甘于被西方话语控制的东方女性,目的在于将东方文化视为与西方文化平等的文化;《喜福会》以母女对话方式进行东西方的对话,目的在于表现东方与西方处于不断接受彼此、不断改变双方关系的过程之中。

无论如何表现,双方的对话打破了西方的独语、构建了双方的平等与开放的关系。通过各种相互抗衡的声音的对话,华美小说获得了最终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Abrama, M. H.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 [2] Baym, Nina.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99.
- [3] Parikh, Crystal & Daniel Y. Kim.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The Dialogic Nature of Chinese American Novels

YIN Yan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40, China)

Abstract: As part of Asian American novels and developing in parallel with Asian American novels, the writing of Chinese American novels began in the 19th century and began to explode after World War II. The study of Chinese American novels began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and has now become one of the directions of Anglo-American literature research. Chinese American novel criticism emphasizes hybridity, diversity and heterogeneity. The research content has gone beyond identity politics and moved towards pluralistic humanistic criticism. There are various competing voices in Chinese American novels. Bakhtin's dialogic theory is an effective means of interpreting Chinese American novels. These dialogues are ultimately dialogue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ey answer the questions of how to treat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how to position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Chinese Americans. Through dialogue, the monologue of the West is broken; from silence to the desire for recogni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dependent identity, Eastern discourse realizes the recognition of its own cultural identity.

Key words: dialogic theory; Chinese American novels; cultural identity; monologue; Eastern discourse

(责任编辑:桂杉杉)

(上接第195页)

参考文献:

[1]白静.“新质生产力”释放中国发展重要信号[J].中国科技产业,2024(2):22-23.

[2]冯新广,吴小平,夏伟.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路径选择与院校作为[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3(11):5-10.

[3]覃鸿妮,谢钰珍,吴凡,等.基于产学研平台的《基因工程技术》课堂教学改革与实践[J].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电子刊),2023(16):41-43.

[4]徐立君.高职院校生态课堂的构建策略——基于“三教”改革视域[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3(10):89-91.

[5]张燕,胡颖,杨税,等.药品生产质量管理实务课程教

学改革初探[J].现代职业教育,2021(4):118-119.

[6]王奇民.制约大学英语教学目标实施因素调查与对策——校企协同教育视角[J].外语界,2015(3):22-29.

[7]曹健,翟孙平,向毅,等.校企协同教育有效培养大学生工程素质的探索[J].高等建筑教育,2014,23(6):147-153.

[8]刘晓宁,张翠爱,罗强,等.基于CDIO理念的卓越农林人才校企协同教育模式创新研究[J].西部素质教育,2017,3(23):78-80.

[9]李玉凤,唐启涛,陈祖满,等.制药工程专业“GMP实务”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J].科教文汇,2023(24):114-117.

[10]杨雪洁,李海英,赵燕燕,等.“GMP实务”课程思政建设路径探索[J].卫生职业教育,2023,41(23):63-66.

Teaching Reform and Practice of the “GMP Practice” Course under the Construction of a School-enterprise Collaborative Eco-class

LUO Kai, QIN Hong-ni, WU Fan

(Suzhou Industrial Park Institute of Services Outsourcing, Suzhou Jiangsu 215123, China)

Abstract: As the educational model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and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direction of th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has been difficult to meet the need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vocational position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iscuss the teaching reform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GMP Practice” course in the context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ve eco-class construction. By analyzing the problems of the current “GMP Practice” course, it puts forward the reform plan of updating the course content, innovating the teaching method and optimizing the evaluation mechanism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ctual needs of the enterprises. By adopt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case study analysis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etc., it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student learning effect be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form measures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practical operation ability and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and enhance the applicability and relevance of the course. Finally, this paper also concludes with suggestion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the school-enterprise collaborative teaching mode. It not only provides specific teaching reform strategies for the “GMP Practice” course, but also provides reference for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in other professional courses.

Key words: school-enterprise collaboration; eco-class; GMP Practice; teaching reform; practical application

(责任编辑:章樊)